

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辑

# 塞上忆往

杨令德回忆录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## 塞上忆往

——杨令德回忆录

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附属印刷厂印刷

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印张10 字数266千字

1988年12月第一版 印数 1—5000

# 目 录

## 永恒的怀念

- 代序……………谢汝珍 ( 1 )

## 塞上忆往…………… ( 3 )

- 一、归绥中学和《西北实业报》…………… ( 3 )

- 二、演话剧和砸“盛记”…………… ( 4 )

- 三、白话文引起的风波…………… ( 6 )

- 四、学生“开除”校长…………… ( 8 )

- 五、蒋听松与《西北民报》…………… ( 9 )

- 六、新文化在青年中传播…………… ( 11 )

## 鲁迅著作初期在我区西部的传播…………… ( 14 )

## 创造社一段史话

- 60年前的两封公开信…………… ( 16 )

## 五四初期新文化运动在绥远地区的传播…………… ( 21 )

## 回忆包头《西北民报》…………… ( 27 )

## 绥远文化、新闻界见闻…………… ( 30 )

## 傅作义将军主绥期间绥远地区新闻报纸出版简况…………… ( 50 )

## 绥远新闻社…………… ( 56 )

## 绥远新闻事业之沿革与现况 (1934年著)…………… ( 63 )

## 国民党绥远地方派系琐记…………… ( 69 )

## 怀念傅作义、邓宝珊两将军

- 为绥远“九·一九”和平起义36周年而作…………… ( 83 )
- 邓宝珊与傅作义的结识和共事始末…………… ( 86 )
- 抗战期间马占山与邓宝珊、傅作义的交往…………… ( 120 )
- 伊盟事变侧闻点滴…………… ( 123 )
- 毛主席给我的两封信**…………… ( 127 )
- 日记残页抄…………… ( 130 )
  - 一、1936年1月1日——4月3日日记
    - 战前绥远动荡概貌…………… ( 130 )
  - 二、1936年4月4日——4月21日日记
    - 战前伊金霍洛之行…………… ( 144 )
  - 三、1936年7月日记
    - 战前五当召之行…………… ( 153 )
  - 四、1936年8月日记
    - 战前西安之行…………… ( 163 )
- 残信录…………… ( 170 )
  - 1938年由榆林寄河曲家信1封…………… ( 170 )
    - 附：1、河曲——榆林行日记…………… ( 171 )
    - 2、榆林——柳林行日记…………… ( 172 )
  - 1938年河曲之行家信10封
    - 邓宝珊将军随行记(上)…………… ( 174 )
    - 附：此行日记…………… ( 182 )
  - 1943年延安、重庆之行家信10封
    - 邓宝珊将军随行记(下)…………… ( 185 )
  - 1945年榆林回绥远家信7封…………… ( 191 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947年二次张家口之行家信3封.....      | (196)      |
| 回忆抗战前夕访问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伊金霍洛见闻... | (198)      |
| 记邵力子与景梅九两先生.....           | (207)      |
| 范长江同志在绥远.....              | (214)      |
| 刘半农的绥远行和一个秘密.....          | (216)      |
| 我与斯诺、斯文赫定、拉铁摩尔的一点接触.....   | (218)      |
| 忆荣祥先生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221)      |
| 忆塞外武术大师——吴桐.....           | (224)      |
| 我所知道的霍亮生先生.....            | (227)      |
| 京宁湘汉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——内蒙政协组织的一次参观.....         | (230)      |
| 诗二首 咏平庄、咏黄河三镇.....         | (239)      |
| 《托克托县志》序言.....             | (240)      |
| <b>我的自传</b> .....          | (241)      |
| 附：杨令德简历.....               | (308)      |
| 附 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喜见晚晴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——赠杨令德兄.....               | 杨植霖 (311)  |
| 悼词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巴图巴根 (312) |
| 后记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编者 (315)   |

# 永恒的怀念

——代序

谢汝珍

令德兄，难道你真的永远离开我了吗？我总觉得你仍然在我身旁似的。

你在医院住了两年多，你常开玩笑说，虽然我们已经生活了53年，由于过去忙于奔波，很少能象这两年形影不离，我们真正的生活是在医院里。是啊，这两年多，我一直陪伴在你的病榻前。病情时好时坏，而你的情绪总是那样乐观，你与病魔顽强搏斗的意志感染了我，使我存在着你有一天会完全康复的希望。但是，在我内心深处，也时时耽心你病情会进一步发展。10月21日上午11时30分，这个可怕的时刻还是到来了。你安详地闭着眼睛，停止了呼吸，永远长眠了。金婚又三载，一朝连理断，我悲痛的心情是难以描绘的。

令德兄，在医院期间，有一天我外出，正值黄昏前，一轮红日缓缓西落，它把霞光留在天上，红红的，一片晚晴。我顿时想起了你。你不就是这样吗？病重入院，明知生命的最后时刻快来临了，但你竟然全不在意，只要有可能，就去参加必要的会议，发表自己的看法。有时你还让我领你去逛古旧书店购买书籍。读书是你一生最大的嗜好。在病榻上你还标点唐宋诗词、古文小品等书，而且经常背诵你小时候背过的诗词文章，你说这是身不由己，脑子空闲不下来。你从这里得到欢乐和安慰。但是，你最大的欣慰莫过于为后人多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。你一生坎坷，经历

丰富，在卧病期间，只要病情允许，你便要写作。往往是一边输液，你一边口述，我在一边作记录。最后你再修改定稿。这些文章在报纸发表后，你总是精心剪下来，有的还要复印，作为纪念。尤其令人不能忘怀的是，进入9月后，病情本来已很严重了，你仍然奋笔疾书，写了一篇纪念绥远“九·一九”和平起义36周年的文章《怀念傅作义、邓宝珊两将军》。你这篇最后遗作，9月19日在《内蒙古日报》上发表。我把报纸拿给你看时，你感到十分欣慰。这篇文章里，你用感人肺腑的言词寄语台湾相识，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感情表露于字里行间。你为不能亲眼目睹台湾回归祖国而遗憾，但深信这一天定会到来。你日记里有这样两句话：

“台湾回归祖国日，老夫九泉笑瞑目”，我会时刻记在心里。

令德兄，我们的子女都在各个岗位上勤奋地工作和学习。他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，报效祖国，为四化建设，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尽一份力量。令德啊！您安息吧！祖国和平统一之日，家祭定要告老翁。

（1985年10月）

# 塞上忆往

## 一、归绥中学和《西北实业报》

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的新思想、新文化潮流，直到1921年才冲击到内蒙古西部地区（绥远）来。当时，这个地区唯一的最高学府，是由清末的书院改为学堂的归绥中学。那时已有6个班毕业，尚有4个班，这年春又办了个第十班，招收新生。新任校长是萨拉齐人祁志厚，他是归绥中学早期毕业生，新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归来，一接任，校长就给学校带来了一些新气象。祁志厚从北京请来李广和先生为十一班的语文教员，虽然仅任教半年就被当局以“过激派”的罪名驱逐出境，但李广和先生的半年讲学在归绥地区是产生过影响的，“五四”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在这里开始激荡起来。

我于1921年春考入归绥中学新开办的十一班，同班同学有李裕智（若愚）、吉雅泰（岱峰）、霍世休、武绍文、刘桂、董怡等人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火烧赵家楼等事件，以及后来掀起的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，当时在报纸上已见到了。我从粗通文字开始，就读小说、看报纸，在偏僻的托克托县，京津《益世报》尚可见到，绥远唯一的一份报纸《西北实业报》更是必读。十四、五岁时，就一面模仿报纸的形式自办小报玩，一面向《西北实业报》投稿。我用的笔名是“园叟”，发表的稿件有《捉鬼记》等，是文言笔记体。《西北实业报》的主笔是福建人杨既庵，笔名“椒山后人”，系当时绥远道尹周登皞的幕僚。也许是“园叟”二字迷惑了他，有一天他寄来一封亲笔信，对我有所称许。毕生尽瘁于小学教育的，我们的好校长刘昆山先生，曾因此鼓励我以后也努力当个主笔。

绥远出版新闻报纸，是民国后由包头人王定圻创办的《一报》

开始的。王为同盟会员，辛亥革命进攻归绥时，于枪林弹雨中伤一指。他曾为国会议员，也当过归绥中学校长。在袁世凯强逼议员投票选大总统时，王把袁世凯的“袁”字故意写成“哀”字，作为废票。后来，他在归绥从事反袁运动，被北洋军阀逮捕枪杀。王定圻以后，历届绥远当局继续出版这份日报，不过屡改名称而已。《西北实业报》历史较久，这个报在“椒山后人”主编时，有周颂尧等人参加新闻报道，以剪用京津大报的稿件为主，经常刊登一些旧诗词，如咏青冢之类，只供少数文人唱和消遣，没有起多大作用。到了1921年，《西北实业报》已甚为衰落，很长时间只有编辑一人，除有《余兴》一栏和鸡零狗碎的本市新闻外，其余新闻、通讯均从京津大报剪裁转载。“五四”运动已经快三年了，绥远唯一的这份日报还是这样死气沉沉，也足见当时文化的不景气。

报纸的内容是这样的贫乏，供给人们以精神食粮的书肆又怎样呢？1921年上半年的归绥市，仅在大召东夹道有一个小书铺，当时最新的书是《玉梨魂》、《芸兰日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老残游记》等小说。其实，这些书在内地已是流传较久的了。

我在托克托县上高小时，看的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精忠说岳传》和侠义、公案等杂七杂八的旧小说。初进中学就又被上述这些早已过时的“新书”吸引住了。这时，在学校还没有感觉到“五四”运动新文化潮流的到来，只是学校图书室从外地来的报纸、杂志较多了些，也就使人觉得大开眼界了。

## 二、演话剧和砸“盛记”

1921年暑假前，我得了伤寒病回家，下半年休学。正是这半年，李广和先生在归绥中学十一班，把“五四”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引进了内蒙古西部地区。他介绍白话文，传播新思潮，同学生交友谈心，亲如兄弟。李裕智、吉雅泰年龄较长，同他接触

多、受影响也深。

第二年，我继续在十一班读书。这时，我们班已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，全校也有了改变。同学们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、写信，组织读书会，读到不少新书报。其中有上海群益书社重印的合订本《新青年》，有《时事新报》、《民国日报》的副刊《学灯》、

《觉悟》和《晨报副刊》等，还有亚东版新式标点的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和高语罕的《白话书信》等。大家都贪婪地读着这些感到很新鲜的书刊。甫由北京大学毕业的萨拉齐人白映星一度来十一班讲课，他介绍了杜威和胡适，同时也讲述了一些“五四”运动的新情况，但影响不大。倒是正在北京大学求学的陈志仁和绥远旅京同学会的不少同学，于暑期归来，首次在归绥公演话剧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。绥远旅京学生回归绥公演话剧，先在归绥中学排练，归绥中学的师生配合参加演出，教员演主角的有郭景林先生等人，同学当配角的有数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演出的剧目是《一念差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，地点在旧城大西街同和园。同和园是一个多年的旧剧院，忽然演新剧，真是闻所未闻，所以场场客满。观众也有摇头叹息的，说：“怎么念书娃娃当起戏子来了！”

归绥公演话剧后，归绥中学各县的学生便于暑假中借上北京来的道具到外县演出，把这些话剧又搬到了包头、托克托等地。那时，当然还是男扮女装。后来，中学男女同校了，女子师范学校也成立了，各校同学自己也演起话剧来，便习以为常。

上述为当时文化运动简略概况。社会上的政治运动怎样呢？二者是密切相关的。政治运动更为活跃。

“五四”运动反帝反封建潮流，波及绥远地区虽说较晚，但在“五四”前后，这里的爱国主义教育，却是贯彻始终的。我们从小学时起就把纪念“五七”、“五九”国耻，反对二十一条，反对日本侵略、火烧圆明园、甲午之战，还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课文等等记得很牢。二十年代初的绥远地区，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终于到来了。于是就爆发了走上街头的学生运动。打“盛记”的事就是

在这个期间发生的。当时归绥中学的同学上街宣传抵制日货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，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？李裕智、吉雅泰和我同住一室，一天晚上他俩和我谈及要发动同学宣传抵制日货的事，我们联络同班的武绍文等同学，分头串连。武善鼓动，往往痛哭流涕，极为感人。不久全校学生就纷纷上街宣讲起来。“盛记商行”是较大的一个商店，五金杂货，钟表时装，食品等等，应有尽有。我们宣传队伍，在“盛记”门前演出，他们有人出来干涉，以致引起冲突。次日一早全校同学结队出发，大队人马堵截南北通衢，挡住军警，一队进入“盛记”铺面内，大打出手。同学们中有人在乱砸中负了伤，如孟纯（锡嘏）正在低头狠踏砸碎的怀表等物，十一班的大汉赵炽昌抱着一个大挂钟正好从孟脑后摔下来，孟当即血流如注。这一下，大家都喊“盛记”打伤了人，这还了得，于是就把个盛极一时的“盛记”砸了个稀巴烂。我们还要追究凶手。当时马福祥任绥远都统，连夜派人邀约学生代表在“盛记”商谈善后，我也列为代表之一。我们明知孟纯是被自家人误伤的，而“盛记”也被彻底砸烂了，还闹什么。于是由“盛记”掌柜的赔礼道歉了事。

### 三、白话文引起的风波

1922年下半年绥远师范学校成立，从此这个地区有了两个中等学校。师范系官费，是贫寒学生吃“官馒头”的地方，吉雅泰、董怡和我从归绥中学十一班跑出来投考师范学校。考题是《战国四君论》和关于乌、伊两盟十三旗的问答。第一题好办，因为在高小时就背诵过《古文释义》中不少篇章，而且对《东周列国志》比较熟，凑一篇论文并不难。倒是关于乌伊两盟的问答题，竟交了白卷，因为在高小的地理课本上没有学过，只知道有个土默特特别旗的总管衙门和河西有个准格尔旗，来归绥后在什么地方还见过挂着一个“乌、伊两盟联合办事处”的牌子，但也没有注意。

不管怎样，据说还是取中了，可是后来说对于中学退学投考师范的一概不收，我们只好向学务局交涉。我给学务局长王济若上了“万言书”，吉雅泰他们也找同情我们的中学老师曹诚斋先生等人从旁协助，最后又经过一次考试，总算录取了。这时师范学校设在旧城文庙街，早已开学上课了。

到校不到三天，就出了乱子。其时荣详（耀宸）先生在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，他是仅有的绥远地区旧学根底深厚的人，精于旧诗词，擅长骈体文，在北京求学期间，又拜桐城派姚姬传一门徒为师，专攻古文，因此有“塞北文豪”之称。“塞北文豪”当时是反对新文化的，我们这些直接或间接受到“过激”分子李广和先生影响的青年，则刚刚读了一些《新青年》、《独秀文存》等宣传新文化的书籍和文章，热情正高，几乎要走“全盘西化”的路子。两个“极端”碰在一起，当然要出乱子。荣先生把我们看成轻薄小儿、洪水猛兽，我们也就把他当作桐城谬种、选学妖孽。上午听了荣先生的一堂国文课，他大骂白话文，说《胡适文存》这类书，他一周就可写出一部，我们听了大为诧异。下午是习字，每人写一仿。我从小就没有多写过仿，胡乱涂抹了这么几句：“字之写不好也，笔无罪，墨无罪，砚无罪，纸亦无罪，罪在朕躬。”自称“朕”、称“寡人”，这是李裕智和我们几人当时常用的戏谑之语。一张仿纸写完了这些大字之后，尚有小小余幅，于是我又写了这样的小字：“白话通神，红楼梦、水浒真不可思议；古文讨厌，欧阳修、韩愈算甚么东西。”就在这一堂习字课上，从十一班来的老同学董怡与我不谋而合，比我还露骨，竟明目张胆地写道：“塞北有个大文豪，自大加一点，臭也！”荣先生看了我们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，大发雷霆，以去就力争，非要把我们开除不可。于是我和董怡在师范入学不到一周，就在我的表弟霍世昌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泪的送行下，把铺盖从师范学校搬出来了。这是1922年秋天的事。

我们被“塞北文豪”开除的事，在归绥和在北京的绥远学生

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十一班的同学刘桂投稿北京《晨报》，揭露了这件事，对荣先生冷嘲热讽了一番，这还影响不大。在北京上大学的绥远学生陈志仁、潘秀仁、贾武等许多人，集中火力在《绥远旅京同学会刊》上攻击荣先生，我也接连向《会刊》投稿。《会刊》攻击“塞北文豪”，说理者少，讽刺者多，无非是说荣先生报考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时，不懂“牛顿三定律”，而答以“牛反刍三倒嚼”云云，其实这在当时也算不了什么。谈到被开除事，当时真是满腔义愤，认为新旧不两立，甚至说：“这样的学校，用八抬明轿来请，也不去了！”少年气盛，亦颇狂妄。

#### 四、学生“开除”校长

1923年上半年我又进入旧绥中学，退到十二班。这时学生运动，已由归绥发展到外县，暑假前我同几个同学跑到包头、萨县宣传，也还是在街头演说，抵制日货，同时也联络些当地的高小学生，到处有聚拢来的听众，还是一种自发行动。过了几天回到归绥，才知道学校闹起了风潮。这时祁志厚已赴美国留学去了，继任校长为阎肃（静亭），学监仍是祁任校长时的成章（焕文）先生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学生要求放假一天，学校当局不答应，学生便罢课了。我们从包、萨回来，已罢课数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也加入了罢课行列。最后竟把阎校长和成学监的铺盖扔出校外，因为我在《西北实业报》投过稿，在全体同学开会把阎、成的铺盖扔出去后，众推选我到报馆为此登一启事。我到《西北实业报》找到当时唯一的老编辑郑先生，请他出刊，以归绥中学全体学生名义，誓死不承认阎、成为校长、学监云云的启事。这一下是学生把校长给“开除”了。启事文稿是我临时拟定的，报馆不收费（我投稿也没得过稿费）。

学校乱成一堆了。过了几天，竟发生一部分学生于夜间向教

员室内乱投石子事件。眼看这个学校就要砸散了，我们托县同学，对此不满，便又由我到报馆刊登联名退出学校的声明。大意是：我们反对部分同学的破坏行为，我们从此退出学校，回家度假云云。联名的是耿正模、董怡、秦璧昌、武绍文、霍世休、刘桂、李激、杨沛、焦保国和我共十人。

从祁志厚任校长三年以来的归绥中学，因为当时正值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有了些新气象，也推动了学生运动，掀起过高潮。经过1923年上半年这么一闹，学生运动从此也进入了低潮。这年下半年先由郭象伋（并卿）出面整顿归绥中学，其后很长一个时期，由赵允义任校长，潘秀仁任教导主任，把持了这个学校。归绥中学恢复后，我们这十个联名登报退学的人请求入学，学校当局很干脆，本来就想开除这些捣乱分子，如今他们自动退学，实在是大好事，请他们另作高就吧。从此，我在这里已再没有什么学校可去了。

1924年上半年，耿正模、秦璧昌、霍世休到张家口住了教会学校培植中学，武绍文、李激投考曹州中学，以后成了梁漱溟的大弟子，刘桂住了北京师大附中，我于1924年下半年也到张家口住了培植中学。我们响应上海反基督教大同盟的号召，在这个学校里公开进行反基督教活动，有时在学校的小礼拜堂内，也大声疾呼起来。第二年1925年上海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这个学校就在反帝运动高潮中为我们所摧毁，从此它的中学部永远停办了。

## 五、蒋听松与《西北民报》

1923年国民党改组，国共合作。1925年冯玉祥驻节包头，西北军占据了察绥地区。由于国共合作，察绥地区革命形势也很好，土默特旗蒙古族的先进分子、早期的共产党员李裕智、吉雅泰，这时在包头组织领导了国民党内蒙古省党部（那时共产党

员可以跨党参加国民党)。我是于1924年下半年在奉军统治下的张家口秘密参加了国民党的，并在这时当选为国民党内蒙古省党部的监察委员。

革命形势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。1925年下半年，由共产党人蒋听松任社长、胡英初任总编辑，在包头办起了《西北民报》。这是一张崭新的介绍新文化、新思潮的报纸，篇幅虽然不大（普通大报的一半），但比起死气沉沉的大报《西北实业报》来，却是光芒万丈，异彩夺目。《西北民报》最初石印，很快就改为铅印。我那时在家乡教书，已在《晨报》副刊、《京报》副刊等处发表过一些东西，《西北民报》出版，我就投寄稿件，还在最初石印时期，连续登了我的两篇文章，蒋听松就写信要我到报馆去工作。我一向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，见信真是喜出望外。这年冬，我就在《西北民报》当了小编辑、小记者，一面作外勤采访，一面编一小栏副刊。从此，我就当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新闻记者。

蒋听松，浙江人，当时不过30岁，他写白话文又快又好，《西北民报》的社论大半由他执笔（冯玉祥五原誓师发出的宣言也是蒋的手笔）。胡英初，江西婺源人，年龄略小于蒋，写一手好毛笔字，文亦出色。当时的《西北民报》人员不多，最老的有一位叫周之楚的，大约近50岁；年纪最小的是刘贯一，还不到20岁。《西北民报》出版不到两年，但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不但是新文化的先驱，而且也是用语体文办的第一张报纸。就在这个报纸上，我办了本地区第一个文艺刊物《火坑》。起先是作为《西北民报》的副刊，篇幅不大，随报发行。1926年“三·一八”以后，便在北京印刷，单独出刊。因为用了《火坑》的刊名，便有“火坑社”的名称。其实，这是我和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张罗的，也没有什么组织、章程，大家写稿，我拿印费，编好后由在清华大学求学的霍世休在北京校印出版。那时，包头、北京间还不通邮汇，我把5元一张的交通银行票子夹到一本《辞源》

的书脊里，挂号寄给霍世休，然后另写信告给他这个“秘密”，那时5元钱也就够一期刊物的印费而有余了。“火坑社”的朋友有：我在张家口的同学广东人陈永森，他在北京的报纸上投稿，我以LT的笔名和他合作，后来他在北京住了法学院，由他介绍，又结识了他的朋友、同学万斯年、万鸿年、富良沅、狄景曹、李兆锐等人；1925年我在《西北民报》时，湖南人李记今（他是胡愈之、夏丏尊的学生）寄旧诗求见蒋听松，蒋不喜旧诗，由我接见，从此我和李记今结交了，在包头我们又结识了凌莲舫，李记今后来在河南又结识了张了且、张逢沛等；在绥远，有马映光和我通信为友，霍世休是少年时就在一起搞手写报玩的；还有个通信朋友是河北定县人，我们戏称为“盲诗人”的刘洪河。就是上面这些青年人，先后成为《火坑》的撰稿人，也就是“火坑社”的同仁。那时不相识的青年朋友常常通信订交，我从事新闻事业发轫于《西北民报》，也是由于素不相识的蒋听松一封信就这样订交共事的。

1926年冬，冯玉祥由苏联经外蒙回到后套，在五原誓师后西退。这时察绥地区已为晋军、奉军占据，《西北民报》停刊，报社同仁随军西退。1926年底，我由五原返回家乡托县，次年东北人惠慕侠聘我为他主编的《绥远日报》编辑。苟延残喘多年的《西北实业报》从此停刊，改组为《绥远日报》。就在《西北实业报》原址、原设备的基础上，全地区的报纸又成了“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”，延续了几年。

## 六、新文化在青年中传播

1928年《绥远日报》改组为《绥远党报》。我在国民党“四·一二”后清党时已被开除，这时祁志厚甫由美国归来，即当了绥远地区国民党首领，他又给我恢复了党籍，并任聘我为这个报的总编辑。《火坑》也在这时恢复。祁志厚在绥远不到两年就垮台了，我也随祁于1930年到了太原，在《陆海空军日报》当了半年编

辑、总编辑。

1931年，傅作义继李培基任绥远省主席。从此进入三十年代。直到“七七”事变前夕，呼和浩特先后有大报二：《绥远日报》、《民国日报》（后改为《西北日报》）；小报三：《社会日报》、《朝报》、《绥闻晚报》。包头也出了一张小报：《包头日报》。通讯社也多起来了，有“绥远通讯社”、“绥远新闻社”、“塞北通讯社”、“绥蒙通讯社”，“边疆通讯社”，五花八门，背景复杂，这且不说。下面只略述文艺刊物和报纸副刊的一些片断。

1931年我认识了张季鸾，当了天津《大公报》驻绥记者。同时也先后在《民国日报》、《西北日报》当副刊编辑，兼《社会日报》总编辑。当时人们把副刊叫作“报屁股”，并不重视，副刊编辑也不是报馆主要人物。我当副刊编辑时间很长，副刊是偏重文艺的，我在《民国日报》辟了题为《十字街头》的专栏，每天刊登一些杂文和诗歌小品，成为不少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发表作品的园地（在我主编地方新闻版时，一度由高沐鸿编《十字街头》）。后来我把《十字街头》改为《塞风》，扩大了篇幅，虽系《民国日报》副刊，实际上是《火坑》的替身，一直出到“七七”事变前夕。抗战期间，在榆林还单独出版了不定期刊《塞风》和“塞风社”丛书《活跃的北战场》、《抗战与蒙古》数种。

《火坑》是在三十年代初停刊的。在《火坑》停刊前后，苏谦益、武达平、杜如薪、刘洪河、马映光出版了不定期刊《血腥》。如果说以《火坑》为刊名是代表一些青年虽已不满但还在忍受旧社会的苦闷，而《血腥》就是比较觉醒地对旧社会进行抗争甚至搏斗了。最后，1936年上半年，以“绥远文艺界抗敌后援会”名义出版了一个大型刊物《燕然》。“抗敌后援会”是在吕骥、任白戈等影响下成立的（“七七”事变前夕，吕、任等曾来过呼和浩特）。《燕然》这个刊物仅昙花一现，却是从“五四”至“七七”这一时期，这个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殿军。“抗敌后援会”联合了当时在呼和浩特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和进步青年，参加